

辽宁大学科研处 ● 1983年

1979—1982

辽宁大学
学术论文选编

前　　言

自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学术年会以来，我校广大教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了进一步激励全校教师更加积极地进行科学的研究，勇于著书立说，从而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同时为了便于交流和逐步积累科研成果，现将1979—1982年间我校教师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分系（室、所）加以选编汇辑，定名《学术论文选编》。同时，对发表论文较多的教师分别编印专集。这项工作今后将作为我校科学的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长期继续下去。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且时间仓促，特别是对编选工作缺乏经验，疏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辽宁大学科研处

1983年4月

目 录

政 治 学

| | | |
|----------------------|---------|----|
|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应予肯定……… | 刘万泉 | 1 |
| 党内斗争必须是讲道理的 | | |
| ——读刘少奇同志《论党内斗争》……… | 刘万泉 | 8 |
| 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 | | |
| 到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 | 曹普澄 李定选 | 14 |
|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 春 明 | 21 |

经 济 学

| | | |
|----------------------|-----------------|----|
| 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 李定选 | 34 |
|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浅谈……… | 乔 刚 | 46 |
| 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 冯玉忠 李定选 | 58 |
| 獐子公社实行管理企业化的调查 | | |
| ……… | 马 云 刘万泉 李定选 乔 刚 | 64 |
| 全面提高经济效果的几个问题……… | 李定选 乔 刚 | 80 |
| 试论经济责任制的内容和形式……… | 李定选 乔 刚 | 91 |

历 史 学

| | | |
|--------------|-----|-----|
| 韦昌辉与金田起义……… | 徐 玲 | 105 |
| 试论刘晏的理财成就……… | 张鸿雁 | 113 |
| 论战国城市的发展……… | 张鸿雁 | 125 |

- 西汉初“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张鸿雁 140
我国大学学报史考···刘万泉 151

文 学

- 打破“章句之学”的框框···钟林斌 161
谢朓及其诗歌简论···宋绪连 167
关于《汉宫秋》的评价问题···钟林斌 206
戏剧史上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一个侧面
···钟林斌 220
鲁迅精神鼓舞我们前进···钟林斌 236
新诗的开拓者···钟林斌 243
论郭沫若早期文学主张的特点及内在矛盾···钟林斌 288
论郭沫若倡导“革命文学”的功绩···钟林斌 306
郭沫若与一九三六年的“两个口号”论争···钟林斌 321
论郭沫若建国后的诗歌创作···钟林斌 333

语 言 学

- “于（於）是”在古籍中的用法···张 军 349
通假字刍议···张 军 360
古汉语中特殊的动宾关系···张 军 364
古汉语偏义复词说略···张 军 张家太 378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应予肯定

刘 万 泉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一提法，不仅从积极方面反映了搞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加强对各项业务工作的具体领导，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各条战线的各级干部提出了更高的必须具备的政治与业务标准。因此，这一提法是正确的，是符合客观要求的，应予肯定。

(一)

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需要懂得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行来领导，这是历史的要求，是不能违背的。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要求，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面前。……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他号召全党要象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那样，“不但会革命，而且会建设。”（《毛泽东选集》第1370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号召，极大地动员和鼓舞了党的各级干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起，就积极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刻苦钻研，努力变自己为搞社会主义的内行。因而，不到几年时间，我们党不仅赢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也赢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一九五六年以后，随着三大改造的胜利，全党的工作重心更加需要转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上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党内一部分同志因为胜利了，革命意志开始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党决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整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把我们党的艰苦奋斗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党的英明措施，受到党内外一致赞扬和拥护。因此，无不积极行动起来，帮助党整顿“三风”，去掉部分党员身上滋长的不良作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无庸置疑，一九五七年整风期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才刚刚建立几年，一小撮反动势力还抱有幻想，梦想变天；少数从旧社会过来的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一套做法还不习惯，有抵触，因而极少数人借党整风之机利用“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一提法妄图取消或推翻党的领导，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决不能因为出了几个反革命，就不加区别地把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提法加以否定。因为否定这一提法不仅否定了我们自己，把我们党摆在了不懂得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外行的位置上去，挫伤了广大干部进一步钻研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业务本领的积极性，而且给那些确实没有钻进去、安于当外行的人钻了空子，以外行领导内行为荣。这是历史的颠倒。这一颠倒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瞎指挥，只按长官意志办事而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坏作风，无不同否定这一提法有关。

林彪、“四人帮”是一伙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黑

帮，因此，他们对否定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提法、破坏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有极大的兴趣。他们一方面把外行领导内行从理论上加以美化，胡说：“‘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只要掌握了普遍真理，就能领导千行万行；另一方面则把我们党对各项建设事业的正确领导诬蔑为“黑线统治”，是什么“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于是，便在所谓“反修防修”、实行“全面专政”的口号下，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动了“大手术”。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什么“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什么“黑帮”、“黑七类”、“臭老九”等等，抄家的抄家，游斗的游斗，劳改的劳改，遣送的遣送，能打倒的打倒，不能打倒的也要打跑，然后把他们那些确实外行、而搞阴谋诡计十足内行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打砸抢分子的“零蛋”人物捧上台去，篡夺各级领导大权。林彪、“四人帮”搞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反革命大破坏，就是从他们篡夺领导权这里开始的。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也充分证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个提法万万否定不得。

(二)

肯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会不会造成一种误解，使人忽视或排斥从政治上加强党对各项建设事业的领导呢？当然不会的。因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个提法本身就是讲的业务、技术的“行”。

早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过：“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当时主要回击有人向党发起

进攻、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而说的。尽管这样，毛泽东同志仍然肯定了我们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业务方面，“有许多还不懂”。毛泽东同志在那次讲话中还尖锐地指出：“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因此他强调地提出要培养自己的庞大的懂得业务、技术的干部队伍的任务。他告诫全党，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一九五七年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而刮起了的瞎指挥风，一九六六年以林彪、“四人帮”把“外行领导内行”当作普遍规律而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历史上出现的这两次大挫折，已经从反面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有人借口政治是统帅，政治要统帅一切、领导一切，因而拒绝政治要挂到业务上，政治工作要结合技术工作一道去做，安于当一个不懂业务、不懂技术的“空头政治家”。有人甚至还制造一种说法：我过去既然能指挥打仗，难道现在我就不能指挥搞建设吗？这是一种典型的把政治与业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确有一大批“大老粗”，或被人们讥讽为“土包子”的干部，在领导革命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凭借什么做出了这些贡献，立下这些功勋呢？是靠空头政治吗？根本不是的。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63～164页）“大老粗”所以能够打胜仗，关键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从战争学习战争”，不断地认识和掌握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

律。历史上不是有大量的事实说明，象王明一类既不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又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的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只能把中国革命引上歧途，使中国革命战争遭到惨重的失败吗？哪有一个不懂革命战争而能领导革命战争打胜仗的呢？

政治从来就不是空洞无物的东西。无产阶级政治从来就是同无产阶级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根本利益和具体任务相结合的。随着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夺得了国家政权，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以后，就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为此，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战场，已不是过去广阔的农村，而是重点转到城市；不是同武装的反动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战斗，而是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方面。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安定团结地发展现代化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最大的政治。这对我们每个党员、每个干部，包括广大知识分子，是个新事物。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有很大的矛盾。但是，一位好的领导者，并不满足以往已经取得的成绩，也并不惧怕前进中的种种困难，而是承认现实，尊重客观规律，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继续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股劲，在攻克新的高峰上再立新功。

(三)

领导干部必须变成内行，这是时代赋予领导干部的光荣使命。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们的国家在一些主要科学技术领域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没有一批精通技术和业务、会

经济管理的专家，实现“四化”的任务是难以完成的。正如列宁说的，“没有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来指导，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26页）

可是，对待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并没有被所有的人承认。当前，阻碍发挥懂业务、有专长人的作用的思想，主要是长官意志在起作用。有的人对他负责的领域、部门的工作业务并不熟悉，对其事物的规律并未掌握，但只因他手中握有大权，就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发号施令，不负责地下达指示。由于他们的过错，而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有的甚而是严重的损失，一般地说，是不受什么谴责和追究的，他们自己也不感到有什么理亏的，因为有“铁饭碗”和“终身职”的保证，自然也就习以为常了。治这种顽症的最好办法，就是踢开铁椅子，变终身职为选举制，让广大群众选举那些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干劲、有钻劲、有魄力、有水平、懂技术懂业务、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人担任领导职务。待遇也应该是随着职务变化而变化的。

还有一种人，也是屡见不鲜的，成天不为“四化”操心，专为个人小安乐窝操劳，不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而为自己谋私利、拉关系、走后门卖力。这种人一般说，不学习，不钻研，常常靠那点老本应付一阵子，至今已有三、四十年的工作经历了，但还是“隔行如隔山”。靠这种人去领导，一害自己，二害国家，工作没有不出乱子的。治这种思想僵化症，毛泽东同志早有指示：“如果老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应当改换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5～206页）

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情况，就得学习。学习什么？学习政治固然重要，但同时要重视学会搞好四个现代化的本领。正如周总理讲的，“学习政治我赞成，但是要精通技术，不能占用

钻研业务的时间。”（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全党必须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而努力学会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本领时，讲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

“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过渡到共产主义。究竟还缺少什么呢？缺什么，很明显：作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如果拿莫斯科的四千七百个负责的共产党和这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在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是很怀疑的。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36页）列宁的这段话，很值得我们今天正在从事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每一个共产党员深思和警惕。

最近几年，党中央已经发出了“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号召，要求全党同志，各级干部，都要在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基础上，学技术，学业务，做到又红又专。我们以学习的实际成果，变外行为内行的巨大成绩，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

党内斗争必须是讲道理的

——读刘少奇同志《论党内斗争》

刘 万 泉

《论党内斗争》一文，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在华中局党校作的演讲，是一篇闪烁马克思主义光辉的重要文献。它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地总结了我们党在自身建设方面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它不仅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同毛泽东同志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一样，为每个同志所必读，对搞好整风运动起了巨大作用，而且多少年来这篇文献中阐述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和原则，一直被全党同志所牢记、所遵循，从而保证了我们党的团结、统一和巩固，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现在举国上下，正在同心同德、聚精会神地搞四化，此时此刻，重读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内斗争》，对于我们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搞好党的建设和党内团结，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党的团结，是有原则的，它要靠正确的党内斗争来保证。我们党五十九年的历史，是一部伟大的斗争史，这里既有同党

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也有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在党内斗争这个问题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尤其在错误路线统治时期，教训更为沉痛。比如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期间，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采取对付罪犯和敌人的斗争方式来对付党内同志，它极大地削弱了党，破坏了党，使革命事业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挫折。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十年的大破坏、党内斗争的扩大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规模、程度和后果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错误路线，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吃够了苦头，这次沉痛的教训实在是令人难以忘记，这个历史悲剧今后再也不能让它重演了。

如何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五十多年来，我们党有极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党内斗争一定要讲道理。正如刘少奇同志说：“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与斗争。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否则不行。道理讲清楚了，一切都好办，都容易办。我们要在党内养成讲道理的作风。如果不讲道理，或讲不清楚道理，结果就只有依靠蛮横，依靠手段，依靠组织上所赋予的权力，甚至依靠欺骗，来解决问题了。”可见，进行党内斗争是不是坚持讲道理，乃是关系到党的性质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党是团结统一还是分裂瓦解的问题。

道理，就是“那些实际事实与被实践所证明了的真正的道理”。所谓讲道理，就是实事求是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一个人的错误总是具体的，又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产生的，这就要求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具体的、客观的分析。不能把思想问题、作风问题、倾向问题和路线问题，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把思想、

倾向问题一概说成是路线问题，更不能把党内斗争说成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应该是错误有多大就说多大，属什么错误就定什么错误，这才能使犯错误的人认识错误，今后不犯或少犯错误，同时也使其他同志受到教育。因此，我们党历来强调，帮助犯错误的同志，一定要诚恳、坦率、热情，顾大体、识大局，不可感情用事，搞过火斗争，而是要和风细雨，以理服人，运用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延安整风中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和加强党的团结的基本方针和重要经验，正在于此。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党延安整风的好传统没有得到一贯坚持。例如，一九五九年庐山出现的那一场党内斗争之所以不适当，就是不讲道理，把彭德怀同志提出的正确批评意见，错误地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斗争，使一位身经百战的老英雄蒙受不白之冤，也把提出正确意见的党内许多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此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又重复出现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动目的，利用我们党在形势估计和斗争方针、方法上的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一条极左路线，人为地制造和扩大“党内斗争”，使用残酷手段，摧残、陷害我党广大干部和党员。《论党内斗争》中列举过的错误的党内斗争的种种表现，比比皆是，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狂叫党内“特务如麻”、“叛徒成堆”“走资派遍地走”，煽动“横扫一切”，“层层揪斗”，“上挂下联”，斗、斗、斗！罢、罢、罢！打倒一大批，株连一大片，使我们党内大批老同志、受全党尊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到残酷迫害，甚至摧残致死，造成我党历史上一场骇人听闻的大浩劫，给我国各族人民带来

了深重灾难。每当谈及，令人发指。当然，林彪、“四人帮”在党内推行极左路线，大搞斗争，大搞破坏，大搞夺权，其反革命性质与我们党犯过火斗争的错误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混同。但是，党内的极左思潮却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而且他们的极左路线又进一步毒害和欺骗了相当一部分缺乏政治经验的干部和群众，在党内大搞不讲道理的斗争。一些人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论在什么问题上都搞不妥协的斗争，有的甚至为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捞到一根什么稻草，竟采取卑劣手段，搜集别人的讲话，断章取义，摘下只言片语，穿串编辩，无限上纲，强加于人。这种人正象刘少奇同志所形容的那样，成为党内斗争中没有立场的“打手”，无原则的“斗争家”，嗜好斗争的“斗殴家”。这不是我们党的光荣，而是我们党的丑事。事实当然不能证明这些人是“坚定的共产党员”，而只能说明他们是在践踏党内斗争原则，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何在党内出现上述的残酷斗争呢？为何居然横行长达十年之久？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根源，但主要的有：

第一、党内思想路线不端正。党内思想路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党内斗争中所以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主要是偏离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唯心主义多，形而上学也猖獗，对形势缺乏正确估计，时时事事强调搞阶级斗争。加之林彪、“四人帮”千方百计干扰破坏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在党内系统地、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导，推行他们那一套现得利，背警句，紧跟照办的实用主义哲学，把党内思想束缚得死死的，使得党员视野不开阔，嗅觉不灵敏，真伪辨

不清，对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内斗争，什么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内斗争，稀里糊涂，不清不楚。因此，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毒害下，极左思潮泛滥，大搞盲干、乱整，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使党和国家遭受巨大损失。

第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影响。从历史看，我们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占相当大的比重，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疯狂性、报复性、投机性往往会反映到党内斗争中来。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帮派斗争，也会影响到党内斗争。因此出现无原则的、过火行为的斗争。警惕这种思想侵蚀党，是极为重要的。

第三、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党内民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集中表现。没有民主就谈不上集中。多年来，我们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内不是“群言堂”，而是一言堂。在党内只准讲恭维话，不愿听“逆耳”言，稍有“越轨”，就上纲上线，轻者挨批，重者下放或坐牢，缺乏平心静气地商讨问题的风气和习惯，因此，“讲道理”只能是少数人的事，这样一斗势必过火，而且无人敢过问。

粉碎“四人帮”以来，尤其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党内政治生活逐步得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得到发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正在发挥它的威力，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要求安定团结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们的党越来越团结了。但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还不能低估，当前，我国各族人民在为实现四化的斗争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也有各种阻力需要克服，党内在认识上也存在着不少分歧，其中有的是带原则性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确是一项重要事情。正确进行党内斗争，是党兴

旺发达、朝气蓬勃的标志。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内斗争》这一光辉文献，是指导我们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思想武器，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再重复过去的那种错误，不再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扩大化，要注意方式，讲道理，以理服人，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进行，使我们国家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保证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实现。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